

老房子



皖南徽派民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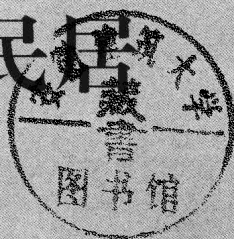
屯溪 黟縣 歙縣 績溪 祁門
休寧 婺源 西遞 漁梁
潛口 呈坎 南屏 瀛洲 查濟
沱川 西溪南 (上冊)



江蘇美術出版社

中國傳統民間建築的
精彩華章

徽派民居



俞宏理

引 言

安徽南部邊陲不僅有秀冠五嶽的黃山勝景，還保留着大量風格迥異的明清民居，呈現出數百年前中國民間建築的餘韻。這似乎是一塊被現代社會的塵囂遺忘了的邊地。凡遊人至此，如見“桃花源裏人家”，無不相見恨晚。近聞在這一帶發現了《陶氏宗譜》和“五柳先生”的後裔，因此更引起了世人的興趣。富有傳奇色彩的是，在青山深處，白雲儘頭，真有一個桃源洞。石洞在離黟縣縣城8公里的石墨嶺上。附近有一個村，名棧閣嶺。古人將壁立千仞的石崖鑿通一洞，通向這“百里煙霞、桃花霑衣”的桃源世界。此洞古時是府縣往來的要塞。一條青石板鋪成的棧道，如迴腸，似捲帶，逶迤連雲。古人曾在石洞上刻有“桃源古洞”四字，並刻有“白雲芳草疑無路，流水桃花別有天”的對聯。不久前，村人從河灘裏撈沙時曾發現了此聯的殘碑。古時石洞上還建有茶庵和桃源書院，岩壁上建有觀音樓，洞內有廟，香火不斷。舊時當地人記載此洞“十里桃花，萬家酒店，洞外下馬，洞裏一天”。遺憾的是本世紀五十年代建設公路時將洞頂炸開。石洞只剩半壁殘石兀立江岸。不過，桃源古洞儘管已不復存在，但是那一個個百戶連片的古村落，卻足以使中外遊人陶醉，使專家學者忘返。

古民居把人們帶進了歷史。人類自以穴、巢爲居起始，隨着生生不息的繁衍，我們的祖先在不斷地改善居住環境的創造中，形成了我國特有的輝煌的建築文化。研究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建築變化發展，可以看出人類對自然條件的

適應、利用和改造的軌跡，可以看出歷史的、社會的、地理及生態環境的變遷。即便是在同一時代，不同地區的建築也直接反映了各個時期人們對生活環境的經營，呈現出不同的文化現象。

以徽派民居爲代表的皖南民居，就是一種極具個性特徵的文化現象——它寄寓了這一地區明清時期的社會、經濟形態和文化意識形態。誠如日本建築學家所說：“建築物是有生命的東西。”（《美學辭典》）古老的建築會說話，像一位龍鍾而又睿智聰慧的老人講經說道。

“四水歸堂”源於“穴居”和“巢居”

10 多年前，徽派民居建築在全國還鮮爲人知。我國一些研究古建的文章和專著中也較少提及徽派民居。直到八十年代中期，隨着旅遊業的發展，人們從黟縣、歙縣等地發現了這些地面上的“文物”。這些民居群“被國內外學者譽爲‘古民居建築藝術的寶庫’、‘東方文化的縮影’”（《黟縣誌》）。好像一顆蒙塵已久的珍珠，一旦拭去塵埃，便熠熠奪目。於是，建築學家、歷史學家、美學家、畫家、攝影家、記者、影視界及中外遊客摩肩接踵、聯袂而至，興起了“徽派民居熱”。

人們進入這些民居時，都在極力探究它的“身世”由來。鑒於徽派民居的最顯著特徵是以天井爲中心的內向合院，四周高牆圍護，外面幾乎看不到瓦，唯以狹長的天井採光、通風與外界溝通。這種以天井爲中心、高牆封閉的基本形制是人們關心的焦點，因而也演繹出各種說法。其中一種流傳



較廣的說法是認為“天井使‘四水歸堂’，是按徽商那種聚財、天降洪福、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典型心理設計的”。這種說法未免有牽強附會之嫌。從時間上看，徽派民居建築風格的形成當在徽商崛起之前。徽商的興盛期是從明中葉到清末之間。明中葉之後才形成“十室九商”的以商賈為徽州居民主體的狀況。但是，目前尚存的地面建築中明代早期的民居就已經是這種以天井為中心的內向封閉組合了。五六百年來，儘管在營建的規模、裝飾、功能等方面有了不少發展，但總體形制未變。這種基本形制應該是經歷了漫長歲月緩慢形成的。至遲可以上溯到唐宋時期。況且，從現在幸存可查的家譜族譜中也可得知很多古村落是建於宋代。因此，認為徽商設計民居形式的說法難以成立。

我以為徽派民居是“穴居”和“巢居”的結合。建築物作為一個載體，它傳遞出社會演變的信息，它記錄了歷史車輪的轍痕。當我們順着建築發展史的脈絡去探尋徽派民居之由來，就可以找出徽派民居這個中國傳統民間建築藝術“驕子”的“遺傳基因”。可以作一個簡單的圖示：

“穴居”——→天 井
“巢居”——→樓上廳/ 徽派民居

· 天井——“穴居”的象徵 其實，被稱作徽商發明的“四水歸堂”的天井，並不是徽派民居獨有的“專利”，也不是明清以後才有，而是原始社會的遺跡。《釋名·釋宮室》曰：‘中央曰中雷。’穴居階段的原始人在穴居頂上開洞照明，雨水從洞口滴下，故謂之‘雷’。後世人稱房屋中央取明處為中雷。天井在南方民居中是神聖的，帶有上古遺風。一般房屋



天井——江西 婺源 汪口(清代)

的中堂就是中雷的演化。”(張銘遠《黃色文明》)由此可知，天井的產生，來源於中華民族的始祖——華夏族的居住遺風，來源於中原一帶原始人類的穴居方式。“天雷”又逐漸演變成在地上挖成露天庭院(天井)，然後在四面挖穴成四合院式，或三合院或一橫一順等式。後來這種地下四合院逐漸轉到地上。

以天井為中心的採用中軸綫為主，兩邊對稱的四合院的佈局方式遠在商代遺址中就已出現。“從商朝後期起，在漫長的中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在氣候懸殊的遼闊土地上，廣泛使用這種四合院的佈局。”(《中國古代建築》羅哲文主編)這種佈局方法，之所以能延續幾千年，是由於它適應古代宗法制度的需要，使尊卑、長幼、主僕各得其所。它其實是一個封建社會的縮影，反映出等級社會的主從關係。在敦煌壁畫中也可以找到唐代庭院以四合院建築的例子。另外，天井的使用，還可以從唐代墓葬中找到遺跡。目前，作為旅遊開放的西安唐乾陵的兩座陪葬墓中，都有天井的設置。懿德太子墓沿甬道縱向排列着七個天井，永泰公主墓有六個天井。永泰公主墓甬道裏一至四個天井下面還對稱地排列着八個便房。這種結構佈局無疑是對唐代現實住居的模擬。因此，有充分理由說明，徽派民居中以天井為中心的四合院的建構模式是北方黃土地區居民自古沿襲的居住方式，是隨着南遷土族傳播到徽州山區的中原文化的顯著特徵之一。

不過，徽州民居中的天井比北方四合院的天井要深得多，這是由於防禦的需要，四面有高牆圍護，儼然如古堡。置

身在四面密不透風的徽派早期民居裏，坐在狹小的天井下“坐井觀天”，有一種安全感，甚至可以說，這其實是地面上的“穴居”生活。

根據調查材料分析，徽派早期民居的雛形，其兩側山牆是我國傳統建築中常見的硬山兩面坡，如 。明代早期民居還有磚砌的仿木人字型搏風板，如 。兩側山牆原本就封閉的。徽派民居的高牆封閉主要指前後兩面高牆。徽派民居的顯著特徵是使用正面高牆和後面高牆堵住了原先兩面坡房子從前後泄雨水，這就勢必要使雨水從四面匯入天井堂前，就是後人說的“四水歸堂”，再從陰溝排出屋外。

樓上廳——“巢居”的象徵 與天井的來歷相反，徽派民居中的“樓上廳”現象則清晰地打上了巢居的印記。

徽派民居與北方四合院不同的特點還有，它沒有平房，自古就是樓房。明代謝肇淛在《五雜俎》中說：“余在新安（徽州古稱新安郡，故後人以“新安”指徽州。——筆者注）見人家多樓上加樓，未嘗有無樓之屋也。”這句話說明，明代學者已注意到這一現象。明代徽州民居的特徵之一便是“樓上廳”。樓下低矮，樓上宏敞；樓下閣柵外露，不加修飾；樓上則方磚鋪地，望磚蒙頂。為什麼古代徽州居民主要生活在樓上呢？這種與其他地區迥然不同的習俗究竟有什麼涵義？這個問題曾引起許多建築學家和史學家的興趣。有一種推測認為元代統治者為鎮壓南方人民的反抗，在每戶駐紮一個元兵，民間稱“韃子”，因“韃子”住樓下，主人建房時便有意把樓下建低樓上建高。這種說法是經不起推敲的。其一，元朝統治不足百年，徽人不會因供養“韃子”從而家户户改

建住宅。其二，漢族地博人衆，元兵不可能做到每戶駐紮一兵。曾有資料載“十戶駐紮一人”的，因此個別現象不能代替整體的居住需要。其三，即使假設樓下低矮是因住“韃子”之故，那麼元亡以後，明代三百年還一直保留這種建構也就於情於理不合了。

合乎情理的解釋只能是，遠古時期這一帶棲息山林的土著居民是以巢居的方式生活的，隨着時代的進步逐漸演變成干欄式高足建築。它的優點是下部開敞，空氣流通。南方山區氣候濕潤、瘴癘之氣彌漫。人居樓上，可防瘴癘之氣，並且地上的毒蛇、猛獸不易爲害。還由於背山傍水而居，暴雨過後山洪沖刷，溪水陡漲，干欄式建築可以防洪。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遺址中即有干欄式的條形建築出現。古徽州的地理位置距此不遠，自然也是很早使用干欄式建築的。東晉以後，中原士族南徙徽州山區，爲適應山區險惡的環境，免遭洪水、毒蛇、猛獸的襲擊，在樓層設計上沿用了山越土著居民的干欄式樣。一樓不住人，或住僕人，因而低矮，主人在樓上居住，二樓才是全家的居住活動中心，因而高且寬敞。隨着地理環境的改變，毒蛇、猛獸逐漸稀少，加上村落水圳、河壩等水利設施的興建，原先威脅樓下居住的因素已逐漸消失，人們自然從樓上轉移到樓下居住了。因此，到清代以後，“樓上廳”已消失，樓下成爲人們的主要活動中心。

分析“天井”與“樓上廳”的產生背景，有助於認識徽派民居的淵源與流變。

古村落形成探源

爲了真正瞭解徽派民居，讓我們去尋覓徽州先民筚路藍縷開發創業的履痕吧。

古徽州土著先民生活在一個山高水險、天然封閉的環境裏。遠古時屬三苗族，漢稱“山越”。漢末三國時，孫吳政權重兵懾服山越，打開徽州門戶。自此，天塹地促的地理環境成了接納北方土族躲避戰亂的棲息之地，成了文人仕宦縱情山水、寄身林泉的理想之所。我國歷史上有過幾次重大的人口南徙，促使中原文化的傳播，加速南方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北方人士南徙徽州，是我國歷史上人口南徙漩渦中的組成部分。南宋歙人羅願的《新安志》便有中原人士“避地家於新安”的記載。此後，明代程尚寬《新安名族誌》、弘治《徽州府誌》等方誌、家譜均多有記載。徽州這一彈丸之地在晉、唐末、南宋三次重大的人口南徙中接納了來自北方十三個省的人口，這爲東、西、南、北、中的各種區域文化在這一狹小地區的融合發展創造了條件，爲綜合不同地區特點的建築風格產生了重要的契機。原先單一的山越文化逐漸發展成新質的新安文化。

物換星移，世事變遷。如今早已無處尋覓山越土著先民的居住遺址。宋、元兩季，目前在皖南能看見的只是少數寺、橋、塔、書院遺址。作爲先民居住的祖廬，最古老的只是明中葉早期。明中葉至明末的舊宅還爲數不少，尚存的大量是清代及民國老宅。從這些明清住宅中，可以看出各個時期的文化烙印，可以瞭解古村落的孕育、發展過程。

皖南古民居集中的村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以同姓居民為主。方誌載：“千丁之家，不動一坯；千丁之族，未嘗散處；千載譜系，絲毫不紊；主僕之嚴，數十世不改。”從分析徽州家族的族譜入手，得出一條結論，“徽州大多數村落均為南遷避亂者所建。”這說明皖南古村落尚在胚胎階段就將血緣和地域連在一起了。這是徽州古村落在雛形期就具有的基本特徵。

“遷徽氏族多以自己的始祖或遷祖為中心，集居繁衍，形成宗族，常以族姓名居住地。當原居地發生地狹人稠矛盾後，始分居他鄉。一般一族聚居一村，也有按房系分居幾村，有的累世同居。”（《徽州地區簡誌》）南遷的土族定居一地，便形成一村。“族的發展，如幹生枝，枝又生葉，而其一族人遂遍佈於天下。”（《中國宗族制度史》）古村落的發展與族的發展並行不悖。隨着族的分支，原先的村落也如同老樹發出的新枝，又繁衍出眾多新的村落。如是歲月更替，山勢逶迤、蜿蜒崎嶇的皖南深山便有了星羅棋佈的大、小村莊。這些村莊實際上都是一些封建勢力很强的封建莊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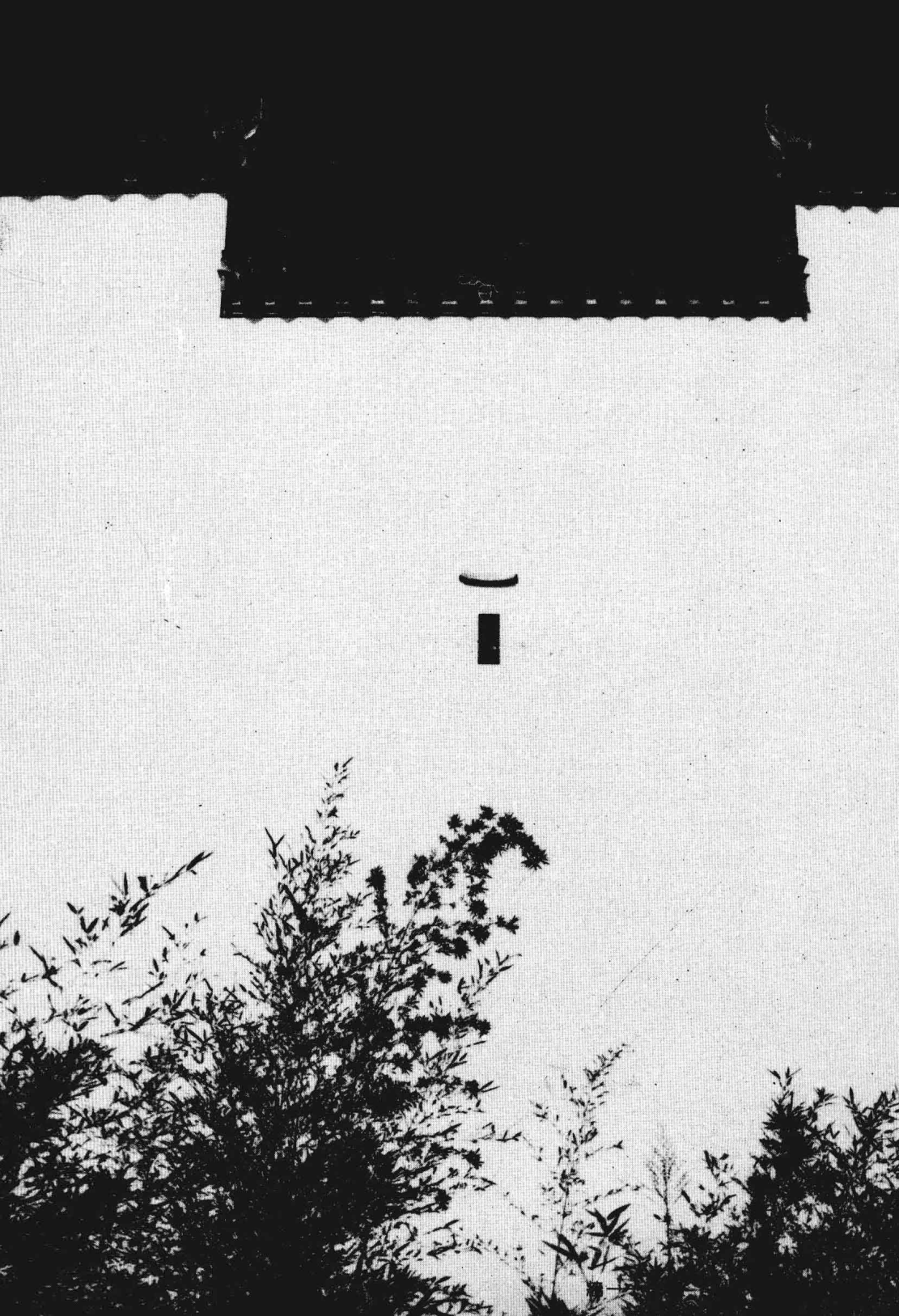
古村落從形成、發展到勃興、鼎盛以至衰落，經歷了一千五百多年。其間徽州社會產生了深刻的變化。萬曆《歙誌·風土》記載了明代徽州社會的變化：弘治年間“家給人足，居則有室，佃則有田，薪則有山，藝則有圃。”“婦人紡織，男子桑蓬，臧獲服勞，比鄰敦睦。”“尋至正德末，嘉靖初則稍異矣：出賈既多，土田不重。操資交捷，起落不常。”“迨至嘉靖末隆慶間則尤異矣：末富居多，本富儘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起者獨雄，落者辟易。”這段話揭示了明代的社會矛盾，

對瞭解徽州社會變化很具有代表性。

隨着徽州社會的變化，村落也形成不同的形態特徵。我認爲概括起來可以用三個階段表示：防禦型村落——田園型村落——寄生型村落。

防禦型村落 晉至南宋的八百餘年，經歷了動蕩不安的漫長歲月。三次大規模南徙及無數次小範圍的境內的人口遷徙，都在這期間。這是漢文化與越文化逐漸交融的時期。交融的過程，其實也是交織着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痛苦較量的過程，南遷的中原士族在這片叢莽世界裏安營紮寨、開發家園，既要躲避戰亂，又要防止野獸的襲擊，還要對付尚未悉服的好武習戰、攀嶺越谷騰躍如飛的山越人的騷擾。他們不得不把村落的防禦性放在第一位。防禦性的第一個表現就是呈封建莊園式的聚族集居。同姓同族選擇山谷隘口、易守難攻的地方，幾十戶密集型構屋居住。戶與戶之間都有高牆、深巷相連，巷道上建券門，如同城池、門闕的建築方式。一個村是一片相連的建築群。這種初期的村落形態一直影響到清末。現在還隨處可見這種古村落，從水口入村便如入迷宮，戶與戶相連，有的還築望樓，形成“群屋一體”的佈局。這種封建莊園式村落，類似防禦性很强的軍事堡壘。古村落大多是背山面水的形式。山與水構成天然的屏障。背山面水的階梯式村落在皖南至今還是最常見的。

田園型村落 南宋經元季到明初這三百多年，是徽州社會、經濟、文化由開發、穩步發展到逐漸繁榮的時期，村落形態由防禦型向田園型過渡。



中原一帶連年征戰，先進的生產力屢屢受到破壞，而使閉塞的皖南山區獲得了發展的契機。隨着南遷，這裏大規模接受了中原文化，積蓄了中原先進的生產力。

與此同時，皖南一帶讀書蔚然成風。南遷士族本多為讀書之人，生活稍安後便發憤攻讀，走科舉入仕之途。弘治《徽州府誌》載：“（徽州）益尚文雅，宋名臣輩出，多為御史諫官者。自朱子而後，為士者多明義理，稱為‘東南鄒魯’。”至明以後，科舉入仕的逐漸增多。“一門九進士，同胞兩翰林”的情況並不鮮見，出現了一些名重朝野的大官，如胡宗憲、汪道昆、許國等。樹牌坊、建書院、修祠堂之風開始興起。同時，在民風民俗上，這一時期崇尚淳美、樸實，受儒家道統思想影響很深。

由於自然地理環境逐步得到治理，人們由單一的面水而居發展到逐水而居，夾溪築屋，街貫巷連。村落景觀與自然景觀融為一體。在一些集居的大姓村落四周，出現了一些以佃農為生的小姓散居居民。他們在大姓的奴役下終年躬耕。這些客姓居民是奴隸社會“佃僕制”的殘餘。他們不能與大姓通婚，不能平等往來，只能在村外曠野搭棚居住，俗稱“棚民”。傍水的地方還有一些“船民”，沿新安江、率水、橫江、閭江流域“舟居”，從事撐船、背纖的苦活，終年在新安江的主、支流上漂泊，過着浮家浮宅的水上生活。

漁樵耕讀，安居樂業，共同構成了田園牧歌情調的田園式村落景觀。

寄生型村落 從明中葉開始一直到清乾隆年間，徽州經濟文化出現畸形繁榮的鼎盛時期。此間大約三四百年，一

直到民國初年才逐漸式微。這一時期的村落已由田園型變為商賈豪富聚居和文人名士隱居的寄生型村落。

徽州經濟勃起緣於兩個機遇：其一是明中葉國家的商品經濟開始活躍。其二是徽州地狹人稠的矛盾日益尖銳，加上旱災水澇，“耕獲十不贍一”，為求生存，徽人只得離鄉背井，“仰給四方”，外出經商作生意。經商成了徽人的“第一等生業”。自古“多難興邦”，徽商正是在這樣的主客觀條件下應運而生並迅速發展。其時有“無徽不成鎮”之諺。《中國史綱要》中指出隨着商品數量的增多，商業資本也非常活躍，在全國出現了更多的商人，其中最多的是徽商，其次是西商、江右商……。徽商處在執江南財政之牛耳的顯赫地位。商人中有“藏鏹至百萬”者。這些衣錦還鄉的富商大賈，不惜萬金置宅院、建園林、興祠堂。住宅越建越氣派，雕刻越來越精細。荒陋的山村成了浮靡的井市。名噪宇內的戲劇家湯顯祖在明萬曆年間寫有一首詩：“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遊；一生痴絕處，無夢到徽州。”有人說這首詩是湯顯祖對徽州繁華的贊譽；有人說這是湯顯祖對徽州金銀氣瀰漫的嘲諷。有一點是共同的，都是指這首詩勾畫出了徽州畸形繁榮的景象。到明末清初，徽人已大部分從農業中分離，商人成了主體，方誌稱“農十之三，賈七焉”，這是一說；“田少民稠，商賈十之九”，這又是一說；“業賈者計七八”也是一說。儘管史料記載的比例不一，但卻足可說明徽地營商人數已佔絕對多數。

由於民居結構的改變，大大改變了村落的性質。生產型已變為消費型。原先那種自給自足的村落形態已經消失，代

之而起的是典型的寄生型村落。家家户户雕樑畫棟，滿室楹聯、字畫。花園、宅院裏假山、魚池，晨夕風露，階柳庭花，極盡奢華。甚至還有一些豪富在宅院開煙館、賭廳，終日沉浸在聲色犬馬之中。這時期的村落景觀如清代《欽事閑談》所載：“鄉村如星列棋佈，凡五里十里，遙望粉牆矗矗，鴛瓦鱗鱗，棹楔崢嶸，鷗吻聳拔，宛如城郭，殊足觀也。”

延至清末民初，隨着徽商一蹶不振，徽州村落景觀建設也隨之停滯並逐漸衰敗。現在尚存的古村落，正是徽州晚期村落，它處處表現出寄生型村落的特徵。

多樣、統一的建築空間

徽派民居以天井為中心，天井正前方為廳堂，廳堂朝天井一面不用門隔斷，形成敞開的活動空間。以一明兩暗的三間式為基礎，連接組合成多種形式。常見的有四種：

1. “”型 即三間式。為三間一進樓房。有廂房的稱“一明兩暗”；沒有廂房的三間朝天井露明，稱“明三間”。明三間一般是在多單元組合的群屋中作大廳，又稱“大廳式”。天井兩側用廊銜接。

在三間式的基礎上也有五間式的，但為數較少。三間式的進深與開間基本相同，平面呈方型，加上四周高牆圍護，形似一顆玉璽，因此又稱為“一顆印”。

2. “回”型 即四合式。俗稱“上下廳”，也稱“上下對堂”。為三間兩進樓房，是兩組三間式相向的組合，即門廳與客廳相對的四合式組合。四合式樓屋又有大四合與小四合兩種。